

编者按:

枣庄因煤而兴,更因中兴煤矿公司而铸就了一段民族工业的辉煌史诗。这座“煤城”不仅是近代中国煤炭工业化的见证者,更是民族自强与工业文化积淀的承载地。从百年前“中兴煤矿”的股份制探索,到铁路、电厂、学校的兴建;从抗日烽火中的工人先锋,到计划经济年代的劳模精神,枣庄将工业血脉深植于城市肌理之中。老矿、老屋、老人——这些看似渐逝的符号,实则是城市人文与工业记忆的活化石。本文讲述的并非只是资源的兴衰,更是一代代矿工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、奋斗与尊严。无论是“飞机楼”的哥特式轮廓,还是矿工宿舍的烟火日常,都在无声中诉说着集体主义的理想与个体生命的坚韧。如今,虽煤炭资源枯竭、矿区转型,但枣庄的工业遗产并未湮没于历史。国家矿山公园的设立、重点文保单位的认证,正是对这段历史的郑重接续。我们当铭记的,不仅是机械的轰鸣与产量的数字,更是那些在黑暗中采掘光明、在苦难中坚守信仰的人。他们的故事——应当成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。我们推荐这篇文字,不仅因其深沉的人文关怀,更因其厚重的工业文化传承,并非怀旧,而是为了在变革的时代中,找到这座工业老城和这个城市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根与魂。让我们共同执笔,为历史补白,为城市存真,为人间留暖。谨以此文,致敬这座城、这个时代和所有在时代浪潮中负重前行、平凡而伟大的枣庄人。



一座矿使这片土地连脉古老的历史,也用绵延百年的辉煌书写城市的变迁,昔日的枣庄煤矿正是这样与枣庄市的今天不可分割,休戚与共。

因煤而兴的枣庄,早在隋唐时期,就有人挖井取煤作薪,古矿井密罗棋布,传说有千余年开采历史。枣庄民间也把采煤矿井称为“煤窑”,故将矿区称为“窑上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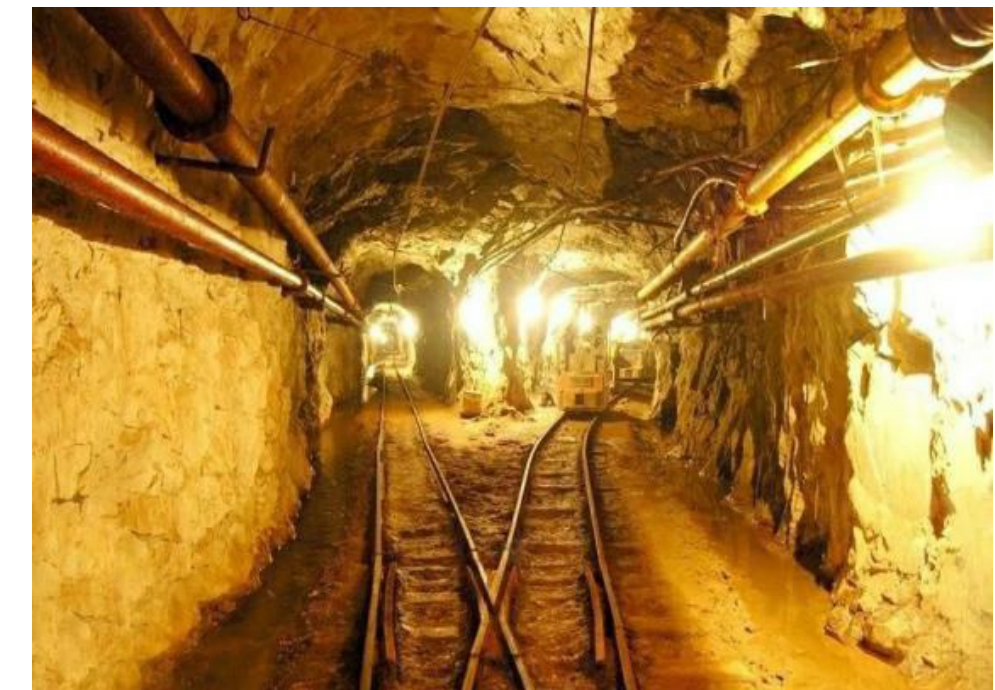
城因煤而生,人也因煤而聚。140多年前,这片土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——中兴煤矿公司,时人俗称“大窑”,便是枣庄煤矿的前身。也是当时与开滦煤矿、抚顺煤矿齐名的中国三大煤矿之一,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开启了中国煤炭工业化开采之路。1931年,时《中国矿业报告》称:“能与外煤竞争者,惟山东中兴煤矿公司”。

中兴煤矿公司先后建有电厂、铁路、码头,兴办医院和多所学校,现在的市中区中心街,也是当年中兴公司成立后扩建的“中新街”,意为中兴公司的新街之意,民间俗称“洋街”,1925年就开始安装电灯,一时间,车马繁驰,商贾云集,也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标志,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仍为枣庄地区的商贸中心,旁边与之相交的胜利路市场曾经是枣庄私营经济发展的象征。

中兴公司发展过程也与民族解放事业密切相关,在枣庄地区成立了第一个矿工工会组织、第一个中共支部、第一支“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”、第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“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”,以中兴矿工和中兴学生为主体的“抗日义勇队第三大队”和“铁道游击队”,曾使日寇闻风丧胆,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史重要组成部分。

煤炭的广泛使用改变了社会经济和生活,给世人带来温暖的背后,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苦难,中兴煤矿公司就曾发现大量遇难矿工遗骸,并建有著名的白骨塔作为祭奠,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中兴煤矿公司办公楼也被称之为“鲁南煤城第一楼”,为德国哥特式建筑风格,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两根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,大坡度起脊红瓦屋面,衬托着突出房顶的塔楼,因俯瞰其外形酷似飞机,故老枣庄人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“飞机楼”。



新中国成立以后,中兴煤矿公司转变成枣庄煤矿。依托矿区成立的枣庄矿务局,下辖枣庄、陶庄、田屯、临沂四个煤矿及邹坞、山家林、甘霖等矿井,还管理华东地质局123勘探队、韩庄电厂等单位,也是山东省当时为数不多的国家直管单位,枣庄也因煤成为山东最早的四个省辖市之一。

那是一个个令三山五岳让路的伟大时代,“工业学大庆,农业学大寨”,人们无比自信地改造社会,怀着对祖国的美好想象而筚路蓝缕,功不唐捐,每个人都能感受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大的力量。

1958年枣庄煤矿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,1959年产煤168万吨,1960年上升到192.3万吨,到1990年共生产原煤3498.5万吨,精煤1691.7万吨。上缴国家利润13139.4万元,仿佛无尽的财富源泉,滋养着这片土地的繁荣,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,也是“煤城”枣庄重要的城市基因和历史文脉所在。

那时矿上有著名的“女子掘进队”,每一个矿工都像个英雄,怀着一颗颗赤诚滚烫的心,冒着生命的危险,在几百米下的昏暗巷道里奋战,煤炭产量屡创新高,矿石山上的矿车日夜不停地倾倒,一车车黑煤矿石怒涛般滚滚而下。枣庄煤矿先后被煤炭部授予“学大庆、赶开滦”先进单位称号,被山东省政府命名为“先进企业”,被中国统配



李风华

老矿老屋和老人 (上)

煤矿总公司命名为“特级质量标准化矿井”,也涌现出“铁人”王进喜式的全国劳动模范。

那时候,矿上运煤的火车从不间断,铁轨上停满了黑色箱式火车皮,来来回回地倒车,时间多得似乎用不完,火车道口的栏杆随时都可能挡下来,有时一堵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即便那时的社会节奏还很慢,时间久了,拦住的行人也难免焦躁起来,有的绕道而行,有的干脆乘火车来回倒车空隙间,弯腰从栏杆下拽住自行车猛窜过去,也总有人选择等待……

矿区到处是拉煤的大卡车,速度极快,风一般地横冲直撞,车上堆满了黑黝黝的炭,高高地冒出尖来,也不断随着车身抖落下来,连同地上旧的煤尘,被巨大的轮胎反复扬到天上,掀起漫天的黑色,滚滚狼烟一般随车飞扬,一会又让风一溜烟席卷而去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煤末的味道。

那时候不知道什么“pm2.5”,也不了解雾霾的危害。高大的矿石山上不断有爬上爬下捡煤的人,随着矿石的滚落来回躲闪,也

光溢彩持续数天,人群川流不息,摩肩接踵,谈笑声鼎沸,可以说万人空巷,比当时上海南京路还拥挤,随处都是疏导人群的警察。在那个思想纯粹的年代,织就了无数人春风沉醉的夜晚,也点燃了我们那些少年的时光。

勤劳朴实的矿工队伍,藏龙卧虎,能人辈出。因此,每年都有很多别出心裁的花灯制作,山水、花鸟、建筑、人物,甚至是矿上各种场景再现,有的集声、光、动一体,惊艳异常,引起看灯人兴致大发,眉飞色舞地讲起花灯里承载的故事来……还有“飞机楼”前面几十米长的,两排水刷石混凝土玻璃展览长廊,挂满了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,仿佛一个个开放的艺术舞台,为那个匮乏的年代增添了一抹文化的色彩。那些宁静而深远的山水画等作品,使儿时的我深深感受到艺术的魅力,舍不得离开。

那正是技术工人无上光荣的时代,每一个八级工老师傅都是传奇般的存在。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”在开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上,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技术的追求和尊重,也没有谁,敢轻松地把这“师”那“师”这样神圣的称呼,随随便便用在自己或别人身上,技术和知识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。也常会看到穿着发白的工作服,骑着擦拭铮亮的自行车,腰上露出大串钥匙和钢板尺的青年工人,飞似的骑行过去,有的昂着脸,特帅气地甩下头发,后面还坐着羞羞的女朋友……

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,也是最安稳的一段日子,所有人都有股野草一样向上奋斗的劲,从不用为将来担忧困扰,生活节奏也没那么快,日子慢慢向前,事情慢慢变好。

那时枣庄煤矿有职工及家属上万人,宿舍几乎遍布市区各处,属于那个年代妥妥的巨无霸,矿工相对工资高、待遇好,口粮多,能分房,还有烤火煤和劈柴票,可以替老换幼,甚至还安排家属工,随便一个矿工收入都可以养活几口人。适逢六十年代人口出生的高峰期,几乎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,七八个孩子的也算不上稀奇,宿舍小巷、路上、开荒地到处都是孩子疯在一起的稚嫩面孔,时不时传来母亲唤儿的声音,谁家买点肉,香味飘出好远。尽管物资凭票供应,条件也很简陋,但整个矿区生活显得从容、自然、平静而生勃勃生机,充满希望,也是计划经济年代无数人的梦想。

北山宿舍是矿上规模最大的家属安置区,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枣庄煤矿扩产期,占地2000多亩,建筑为硬山顶式砖石结构,青砖红瓦,十间一列,形成东西方向狭窄的巷道,屋山南北方向的道路相对宽敞,一趟趟呈阶梯状排列,密密麻麻,像一座庞大的军营,蔚为壮观。宿舍北边连着刘庄村,背靠漫坡的连绵青山,沟壑阡陌纵横,夹带着水库塘坝,一条季节性的河流纵向将宿舍隔为东西两处,人们习惯称之为“大沟”,上面建有拱形大桥,至今完好,并由此形成一条横向分割北山宿舍的东西方向主路,与南北方向的“大沟”形成十字形坐标,路的东头是中学校园,中间为宽阔的三角地状市场,西边通往矿上和市区等地,高峰期居住达四五千人,中小学校、商店菜店、副食品店、露天影院和卫生所等一应俱全,熙熙攘攘,车水马龙,还有货郎鼓、油梆子以及“卖小鸡——哟”的吆喝不断,是方圆十里八乡的中心,也是当时枣庄几乎家喻户晓的地方。

我的父母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搬到北山宿舍。我们家兄妹六人,哥哥和二姐出生后,家里从宿舍大沟西边、路的南面,移至大沟东边、路的北面,住到

紧靠中学校的地方。随着人口的增加,第三次则又从路北移到路南,与中学校门不过一二十米的距离,到我正读的小学也是二三百米的样子。住房面积有最初十余平方米,最后换作四十多平方米,就是两间主屋分别带有配房,形成一个十多平方米的院子。其实,房本上写的不过才三十多平方米,因为当时仅算主房套内面积,配房是不计算在内的。

那时搬家不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。买些石灰泡上水,粉刷一下墙面,扫一扫地上的垃圾,用排车把有限的几件家什搬来便完了。那个年代吃穿用的啥都很少,唯有房子的容纳和利用率极高。当然,漏雨也是常有的事儿,因为是被檐瓦面坡度小,雨量小时瓦沟里的水容易溢漫下来,好在那时每人手都多,大小盆桶、缸罐都派上用场,有接的有倒的,有时还有倒换手的,滴滴答答的,往往外面的雨停了,屋里还滴滴答答着,……后来,矿上统一改成了平房,漏雨也很少发生了。

当时矿上分配家属宿舍的标准是,一个家庭原则上配给一间主房,十五六平方米的样子,南边有个配房,可以拉起一个小的院落。由于人多屋小,每个家庭都没有个人的空间,家里的热闹当然会有,兄弟姊妹间各种趣事见闻总要分享一下,不过多数情况下是打成一团的吵闹,往往挨上家长一耳刮子才罢休。话说,父母的精力也不够,每家都要靠大孩子来带下面年龄小的。

那个年代没有电视,也没有暖气,甚至没有床以外的像样家具,出行靠脚步,自行车也少,“三转一响”即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,是年轻人谈婚论嫁的最奢侈向往。从我记事起,家里最值钱的只有父亲那辆“大金鹿自行车”,其次就是那个巴掌大的,长着两只圆耳朵的闹钟,再没有更多的东西了,家里用暖的地方唯有那个15瓦的白炽灯。最令人温暖的就是炭炉子,矿上配发的烤火煤虽说是煤泥,平日烧火做饭也都够用。在那个普遍用火盆取暖的时代,冬天家里烧上煤炭是件奢侈的事了。寒冬腊月,一家人围炉而坐,听父母讲起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,也说些生活的烟火,炉上的水壶沸腾着,猛地顶起壶盖,翻腾起一阵阵白色水汽,壶嘴也跟着高亢地喘息,屋里氤氲着温暖的水雾,亦温暖着家人的心!

停电是经常的事,说停就停,也都习以为常了。家家都有备用的蜡烛及手电,

却是舍不得多点,当然也没有夜生活,于是就各种等电,要不就出去溜达溜达,夜晚的宿舍,也多了一些来来往往闲逛的人儿,或长时间等不来电,就早早就上床睡觉了。晚上,偌大的宿舍区整肃寂然,电线杆上零星的三两盏水银灯泡,远看像一团白雾裹住的星星,显得格外亮眼,偶尔有狗汪汪叫上几声,幽暗的巷子里顿时显出些吊诡,孤单的身影不由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。

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,也舍不得花钱到影剧院去,那些奔放的激情总要释放出来,偶尔的露天免费电影,当然是自带流量的,浑身是劲的孩子不惜追个十里八里地,回到家也往往后半夜了。多数孩子跟着长辈听过“大鼓”“戏曲”,也追过捏糖人或皮影戏的摊子,更多时候是抽陀螺、打弹弓、抛砖头或耍纸牌等玩意儿,也会用泥巴、木头或铁丝类的弄成枪炮、汽车等孩子们能想象到的各种东西。我曾用黄泥糊过一个小小的炉子,偷偷捡来牛粪,把泥炉子烧得通红。还用作业本糊过几次风筝,尽管想尽了办法,可惜那放飞的不高,但,少年人总会找到乐趣。

收音机是最早进入家庭的电器,岳飞传和杨家将是那会儿的顶流,几乎每个人都想方设法,趁着点儿回家收听刘兰芳那声情并茂的播出,广为人知的说书人还有单田芳、袁阔成,承载了人们追求建功立业、向往忠贞报国的爱好情怀和寄托,还有青春曾经的冲动和懵懂,连同滴滴答答的小喇叭广播,已化成那个时代少年生命的一部分。

宿舍三角地的市场边上,有个我记事起就在那儿的茶水摊,主人姓杨,满头花白的短发,脸上皱纹刻画了岁月痕迹,身后的砖墙矮矮斑斑,摊儿简单而宁静,老人不太说话,来人时浅笑一下,偶尔点下头,算是招呼了,锥形的玻璃杯高低成行,盛满了黄色的茶水,盖着四四方方的玻璃,整齐地摆满了水泥台子,常有人在茶水摊儿前坐下来歇脚,午后的阳光透过篷布,斜照在三三两两慵懒的闲客身上,有一搭无一搭扯些话题,显得温暖又闲适。喝茶的大都是熟人,打个招呼过来,径直拿上盖着的玻璃,端起杯子一饮而尽,后再拿出一分、二分的零钱来,一副平静淡然的生活画面,一旁闻器尘仿佛属于另一个空间。茶摊儿女主人杨奶奶,是位颇受尊重的老人,在孩子眼里有着特殊的光芒,因为,几乎每个母亲都告诉过孩子,这个宿舍上所有的小朋友,都是这位老奶奶从北山上的树林里刨出来的……

那是人与自然高度依存的时代,穿的用的大家都差不多,也没有什么繁文缛节,日子单调悠长,还有点拖沓,天蓝得像电脑屏保的画面,飘着薄薄的几片白云,抬头总会看到呼啦啦成群的麻雀和滑翔穿梭的燕子,偶尔也有排列整齐的大雁。孩子们都追着变换的季节拾麦穗、捞地瓜、吹柳笛儿等,徜徉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,随处都可以放飞一下自我。少年的我一次次跑山,沐浴朝霞和夕阳的瑰丽,也每每抖动青涩的画笔描绘山的模样,春游的同学们在山头上齐唱着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,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……”

宿舍后边的北山和卓山,背后连着无尽的泰沂山脉,山远天高,翠色绵延,波状的山顶馒头似得簇拥着,如起伏的波涛一样壮观,长啸的声音在山间回响,涓涓的溪流蜿蜒而下。山谷里有无尽的杂树、石堰、酸枣和草丛里的蚂蚱,夏日的蝉鸣无休无止,原野飘散着泥土的味道,塘坝上水波粼粼,弯曲的道路两边,茂密的玉米一根根挺拔而立,顶着落晖,无边无际,犹如守护大地的战士……

